

## 拉美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拉整体合作

张 凡\*

**摘 要** 随着 21 世纪初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迅猛发展,双方“整体合作”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整体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拉美地区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拉美地区主义实践经历了伴随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地区一体化”、“开放地区主义”和“后自由主义地区主义”三个阶段,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在具有广泛、灵活特点同时又呈分化、重叠趋势。整体合作意味着拉美地区进程与中拉关系演变出现交集,但整体合作应定位为中拉“全面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未来发展方向,其路径与全面合作的“立体”模式有别,其成败取决于拉美国家协调、统一步伐,但不妨碍双方全面合作的持续展开。中拉整体合作将在拉美充分利用外部条件追求自主与发展的诉求中探索前行之路,但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国别差异、新常态带来的挑战以及制度和地区主义逻辑的不同也会制约整体合作的顺利发展。

**关键词** 中拉整体合作 拉美地区主义 跨区域合作 拉美视角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整体合作阶段。狭义地理解,所谓“整体合作”是指中国为一方与拉美作为整体为一方形成“1+1”合作模式的互动。2015 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拉整体合作机制应运而生。这是中拉关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其效应和后续影响将逐步显现出来。由于整体合作模式正处于初创和形成过程中,中拉关系的实际动态还是以中国和拉美各国双边关系以及与众多次区域组织的合作为主要内容,中拉整体合作应理解为囊括上述内容的中拉“全面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最新成果,同时是一种正在向一对一合作模式推进的动态过

---

\*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通信作者及地址:张凡,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邮编:100007;E-mail:zhang\_fan@cass.org.cn。本文受中国—东盟研究院“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资助(CW201415)。

程,这是一个涉及中拉关系和拉美地区主义的复杂而有趣的现象。

有关地区主义的界定往往以地理毗邻、相互认知和频繁互动的若干国家为出发点,但其基本含义是国家管理区域内部互动和回应外部挑战的明确政策行为。地区主义概念在不断变化、丰富,非国家行为体、非正式交往形式以及不同层次的整合与合作内容均被纳入地区主义研究范围。本文所理解的地区主义是指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特定地区范围内进行合作和协调战略的政策和方案,通常与正式的计划 and 制度建设相关联。地区主义是多维度的地区整合形式,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当代的地区主义实际上由各种不同的地区主义所构成,反映着全球不同区域的条件、价值和意识形态立场,是历史和社会具体环境的产物。与此相关,地区内部自下而上的地区化则是各种共同体和社会在多种多样的地区主义框架中回应内外因素进行合作的进程,是一种动态的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其间整合与分化相互交织,深化与倒退的可能性并存。上述进程往往伴随着地区性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地区组织的涌现,后者逐步成为国际关系的特定行为体开展着自身独特的对外关系。<sup>①</sup>

拉美的地区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一体化梦想,目前的地区主义实践则主要是指20世纪中叶以来出现的区域合作与整合浪潮。21世纪以来拉美地区主义的一个新动向是“中国因素”开始介入拉美地区建设进程。本文旨在探讨中拉整体合作的背景、动力和面临的挑战,特别选取拉美地区主义视角观照这一崭新合作方式的主要问题,探讨中拉合作与拉美地区进程正在形成的关系,以期对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地区之间的跨地区合作模式研究有所贡献。本文首先概括拉美地区主义的思想、实践和特点,然后在中拉关系演变及其动力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拉美地区主义与中拉合作的交集,最后归纳分析影响中拉整体合作的

<sup>①</sup> 参阅 Fredrik Söderbaum,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Todd Landman and Neil Robinso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009, pp. 477—496; Björn Hettne, “Beyo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No. 4, 2005, pp. 543—571; Mary Farrell, “The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An Introduction,” in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London and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2005, pp. 8—9; and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Interregionalism: A new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3—14.

若干因素。本文所谓的拉丁美洲系指西半球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33个独立主权国家,其正式称谓应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

## 一、地区主义视角下的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

### (一)拉美地区主义思想

20世纪30年代以后,拉美主要国家陆续实施了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地区经济一体化成为这一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40年代末始,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经济学家们就提出了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的发展理论。这一理论试图解释拉丁美洲欠发达状态的成因,其核心概念是国际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交换是拉丁美洲欠发达的主要原因,克服这种状态唯有进口替代工业化一途。鉴于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狭小的状况,拉美经委会将地区经济一体化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建议建立拉丁美洲共同市场,以保证实现拉美国家工业化的目标。<sup>①</sup>

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一体化是世界范围地区整合运动的一部分,但这一时期的一体化运动大多陷入困境。直到20世纪90年代,地区主义再次勃兴。与此前的一体化运动有所不同,被冠以“新地区主义”的浪潮追求的是促进出口而非进口替代,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中提高竞争力而非采用保护主义方式将各地区封闭起来。新地区主义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的一大特征,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在拉丁美洲,官、产、学以及国际机构的主流观点趋于否定国家主导的、以政府调控市场为特点的经济模式,开始倡导开放经济特别是放松贸易、金融管制,标志着拉美地区主义的一次重大转向。<sup>②</sup>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拉美政治版图的演变,地区主义的地理、层次和意识形态范围正在重新界定,新一轮的地区主义叙事和话语登场,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再次被置于重要地位。世纪初期逐步抬头的这一倾向明显超越了市场导向地区主义的疆界,反映了拉美地区主义发展中新一轮新理念、新政策

<sup>①</sup> Joseph L. Love,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ism,” in Valpy FitzGerald and Rosemary Thorp, eds., *Economic Doctrine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157—181; 劳尔·普雷维什:《外国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9—133页。

<sup>②</sup> Gordon Mace, Louis Bélanger and contributors, *The Americas in Transitions: The Contour of Regionalism*, Boulder, Colorado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和新制度安排业已登上历史舞台。<sup>①</sup>但这一新趋势的前景尚在未定之天。主导这一趋势的还不是成熟的理论,至多只能是一种政策取向。拉美部分国家偏离新自由主义轨道,主要基于对市场化改革弊端的认识,但还没有找到经济发展包括地区建设更切实可行的道路,因此拉美目前地区主义发展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图景,存在众多不同形式和取向的区域次区域集团。

## (二)拉美地区主义实践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区域一体化浪潮中,拉美是继欧洲之后第二个地区主义发展最有深度、最为多样的地区。拉美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区域或次区域的经济整合进程,突出地表现为一系列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包括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中美洲共同市场、安第斯集团、加勒比自由贸易协会(后改称加勒比共同体)等。这一时期各一体化组织制定了宏伟的目标,并规定了实现目标的期限。一体化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促进了地区贸易的增长,而地区内贸易的增长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内向型发展模式也限制了地区一体化的潜力。

20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欧洲、北美和东亚经济板块的形成,以及苏东转轨国家吸引发展资金的竞争压力,促成了拉美国家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再次勃兴。这一时期地区建设的主要举措包括:南方共同市场正式启动;安第斯5国决定建立自贸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开始运行;加勒比共同体建立共同市场;加勒比国家联盟正式成立等。同时,拉美各国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大量涌现。<sup>②</sup>拉美一体化的新活力带动了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增长,吸引了大量外资涌入,各集团成员国经济普遍实现稳定增长。但这一时期仍暴露了各成员国政策不协调的难题,政府间主义性质的组织机构也未能出现向超国家权力机构演进的任何突破。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拉美国家的结构调整和改革由于国情差异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结果和绩效。许多国家开始对调整和改革的成败得失进行反思,进而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区域合作路径做出了若干修正。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陷入僵局,而巴西领衔的南美国家共同体则宣

<sup>①</sup> Pia Riggirozzi and Diana Tussie, eds., *The Rise of 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Dordrecht, Heidelberg, London and New York: Springer, 2012.

<sup>②</sup> Victor Bulmer-Thoma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97—308.

告成立,并于2008年演变为南美国家联盟。由于其更深层的背景是拉美左翼政治力量崛起并在多数国家上台执政,因此区域合作中的市场驱动含量降低,而政治合作和社会议程日益占有突出的地位。委内瑞拉与古巴联手组建了更加激进和带有反美色彩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15年以后,随着拉美国家国内政党轮替和所谓政治“新生态”的逐步形成,一些区域组织的取向开始调整。由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组成的拉美“太平洋联盟”仍以自由贸易取向彰显着“开放地区主义”的影响。

在拉丁美洲,还有一条与经济整合进程并行的发展脉络。长期以来,主要由中小国家构成的拉丁美洲十分重视国际组织和规范在维持国际秩序、保障中小国家利益方面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中美洲战乱问题,拉美国家成立了孔塔多拉集团,并最终建立了里约集团。这是冷战末期拉美国家独立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而自我组织的最重要的政治合作机制。2010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宣告成立,里约集团的功能遂为新的包括拉美全部33个国家的组织所取代。在从里约集团到拉共体的演变过程中,拉美地区组织与域外组织或域外大国展开了频繁的互动,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的伊比利亚美洲峰会和欧拉对话机制等。拉美与东亚国家建立了东亚—拉美合作论坛,部分拉美国家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成为跨太平洋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2015年初,中国—拉共同体论坛正式成立,中国因素开始介入拉美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

### (三)拉美地区主义的特点

20世纪中叶以来的拉美一体化进程可以归纳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拉美一体化运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拉美一体化运动的每次高涨均与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例如,20世纪50—60年代,正值世界经济在二战后高速发展的上升阶段,凯恩斯主义、现代化学说和发展主义理论是这一时期最受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而发达国家的工业成就、技术进步和现代化水平也是发展中世界模仿和赶超的对象和目标。拉美的工业化及其经济一体化运动,在其取向、目标和形式上都与这种大背景密不可分,其路径选择都与当时世界的观念模式和实际经验相吻合,其中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对拉美的影响尤为明显。20世纪70—8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凯恩斯主义的困境,以及拉美自身发展模式的缺陷和债务危机的困扰,加之冷战结束之际所谓“历史终结”话语的影响,使拉美国家几乎无例外地拥抱了“华盛顿共识”和“开放的地区

主义”。世纪之交以来,欧美各地的反全球化浪潮以及拉美内部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又一次扭转了拉美地区建设的取向,但开放地区主义的影响仍在,拉美地区主义动态映衬着当今世界地区建设思想与实践多种多样色彩斑斓的图景。

第二,拉美地区主义具有独特的地域特点。基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特别是在美国霸权和势力范围所及的西半球,拉美地区主义往往具有明确的外部势力介入的烙印。20世纪60年代,美洲国家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积极参与了拉美一体化进程,其背后有美国影响地区进程的意图。80—90年代,美国推出的“美洲事业倡议”以及“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曾一度主导了拉美地区建设的方向。与此同时,外力的介入又常常激起拉美国家顽强的反弹,使拉美地区主义又带有追求自主和挑战发达国家及其多边机构正统信条的色彩。拉美地区组织所应对的主要挑战也是地区各国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特定历史任务,如二战结束后至今始终居于拉美国家内政外交中心议程的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地区组织“锁定”民主化进程的集体努力,以及屡次提出并在实际进程中制约地区主义发展的社会议程等等,均带有自成一体的拉丁美洲特色。

第三,拉美地区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三维”的动态过程,即经济整合,以各种一体化和合作组织为代表;政治和外交协调,以里约集团为代表;以及“社会间”互动交融,这是历史形成的建立在种族、宗教和语言基础上的亲密联系。因此,拉美一体化突出表现了合作领域和行为体的广泛性与合作形式和措施的灵活性。根据1980年的《蒙得维的亚条约》,拉美自由贸易协会改组为拉美一体化协会,放弃成员国步调一致的做法和限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成员国可自愿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这种情况的正面意义在于,不拘泥于传统理论模式,一体化进程谈判速度加快,合作范围、形式灵活,可根据国情差异区别对待,并可以为更高层次一体化合作积累经验、创造物资和技术条件。<sup>①</sup>

第四,拉美区域合作和整合呈组织分化和机制重叠态势。21世纪初期的图景是众多边界模糊、相互竞争的区域次区域组织共存,每一国家首要定位在于次区域集团,每一新组织的出现都带有对相邻次区域国家的排他性,分散化的“次

---

<sup>①</sup> Olivier Dabène,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Laura Gómez — Mera, *Power and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3. 参阅宋晓平等著:《西半球区域一体化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区域主义”意味着次区域的整合与整个地区的分化并存。因此,在区域次区域集团不断出现、翻新的同时,各组织的实质内容即一体化本身日益空心化。<sup>①</sup>

## 二、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拉整体合作

### (一)中拉关系的发展与中拉合作

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关系的发展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冷战背景下的民间交往(20世纪50—6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没有继承国民党政府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与拉美的联系可以视为中国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的延伸,其间意识形态因素发挥着重大作用。就拉美国家而言,这一时期各国普遍将安全保障和经贸利益实现的愿望寄托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基本追随美国立场。因此,新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开启于民间交往,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古巴革命的胜利,中古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与巴西和智利虽未建交但实现了官方往来。中拉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民间团体交往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内外因素的干扰以及拉美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影响了中拉关系的顺利发展。这一时期中拉关系的突出特征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双边的主要联系纽带是民间外交。<sup>②</sup>

第二阶段:建交高潮、经贸交往与国际事务合作(20世纪70—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拉美国家独立自主外交和对外关系多元化的发展,双方利益交汇点日益明显,处于停滞状态的中拉关系迎来了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自1970年智利与中国建交起,10个拉美国家相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80年代以后,又有8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形成两次建交高潮。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适

<sup>①</sup> 参阅 Andrés Malamud and Gian Luca Gardini, “Has Regionalism Peaked? The Latin American Quagmire and its Lessons,” in Lorenzo Fioramonti, ed., *Regionalism in a Changing Worl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116—133; Diana Tussie, “Latin America: Contrasting Motivations for Regional Project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Supplement S1, 2009, pp. 169—188.

<sup>②</sup> Jiang Shixue,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 in Riordan Roett and Guadalupe Paz, eds.,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28—29; [委内瑞拉]D.博埃斯内尔:《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逢拉美国政治、经济转型和对外政策调整, 双边贸易、经济技术合作逐步展开。冷战终结后, 中拉往来和合作进一步密切、深化。这一阶段的中拉关系与此前的不同在于, 意识形态色彩已经淡出, 政治驱动明显, 经济诉求重要性在逐步加大。<sup>①</sup>

### 第三阶段: 双边关系全面提升和整体合作(21 世纪初期)

进入 21 世纪以后, 中拉关系形成了政治推动、经贸主导, 并涵盖人文、科技、军事及多边领域合作的强劲势头, 在规模和范围上又跃升了一个台阶, 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局面,<sup>②</sup>在这一背景下, 中拉整体合作提上了日程。从拉美国国家来说, 受 2000 年中非论坛建立及其对中非关系的积极影响, 使许多拉美国国家对中拉之间类似论坛的建立和积极作用怀有期待。就中国而言, 整体合作机制完善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地理布局。根据中国领导人访拉时与拉方会晤后的决定, 中拉论坛正式成立。中拉关系将有望形成立体的网络格局。

### (二) 中拉关系的动力及其特点

就拉美国国家而言, 中拉关系发展的驱动因素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1. 中拉关系及其利益格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国日益积极投身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进程, 这与拉美国国家的结构调整与改革特别是开放的地区主义有着相似的政策导向。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中国对于拉美经济的重要性迅速扩大。由于生产和投资的快速增长, 中国开始从拉美进口大量原料、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 双边贸易额急剧扩大, 拉美盛产农矿产品的国家受益匪浅, 包括世界市场价格上升带来的利益。中拉贸易额至 2013 年已达到 2740 亿美元<sup>③</sup>(其后几年有所下降)。中国现在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进口来源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从 2000 年到 2014 年, 中国在拉美进口的占比从 2% 上升到 16%, 在拉

---

<sup>①</sup> Adrian H. Hearn and José Luis León—Manríquez,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 New Era of an Old Exchange,” in Adrian H. Hearn and José Luis León—Manríquez, eds., *China Engages Latin America*,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1, pp. 8—9; 苏振兴主编:《中拉关系 60 年: 回顾与思考》,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0 年。

<sup>②</sup>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北京, 2008 年。

<sup>③</sup>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China, Towards a New Era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United Nations, Printed in Santiago, Chile, May 2015, p. 35.

美出口占比从1%提高到9%(2013年曾达10%)。<sup>①</sup>

与贸易增长相伴,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也迅速增加。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估算,1990—2009年20年间,中国在拉美投资存量总额约为70亿美元。2010年一年,中国在拉美的投资猛增至140亿美元,其后中国投资数额每年保持在90亿—100亿美元左右,占拉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6%。<sup>②</sup>

贸易、投资带来积极“中国效应”的另一面则是拉美国家面临的竞争压力。拉美国家的出口在中国市场长期面临其他国家的竞争,而中国对拉出口虽受消费者青睐,但对拉美当地产业造成了冲击,并对这些产业对第三国的出口形成巨大竞争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强劲势头也对拉美国家外资流入包括技术转让产生了影响。

虽然面临着竞争和压力,但拉美与中国经贸关系却长期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并且极大地促进了政治、外交、多边场合和跨区域交流的步伐。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启动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以后,拉美国家就积极回应了中国在经贸和外交方面的一系列倡议。中国对于持合作态度的国家给予的优惠条件则为进一步的合作创造了可能性,拉美多数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迅速改善,拉美地区组织也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关系。自1990年,中国开始参加里约集团外长年会;90年代,中国成为美洲开发银行和拉美一体化协会的观察员,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加勒比开发银行成员;中国还与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集团、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建立了对话机制,并且在新世纪以后先后成为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和拉丁美洲议会的观察员。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后,拉美的环太平洋国家就与中国利用这一平台展开了跨区域合作,拉美国家还与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共同建立了东亚—拉美合作论坛。

事实上,后冷战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拉美国家明显感受到了国际格局变迁的深刻影响,其中中国的迅猛发展是这种国际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由

---

<sup>①</sup>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China, Towards a New Era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United Nations, Printed in Santiago, Chile, May 2015, pp. 36—37.

<sup>②</sup>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China, Towards a New Era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United Nations, Printed in Santiago, Chile, May 2015, p. 59.

于中国发展特别是贸易投资机遇的吸引力和国际变局诸因素的助推,拉美 33 个国家与中国合作推出了“整体合作”,共同完成了双边关系发展包括合作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突破。

2. 中国与拉美:发展互鉴。中国因素本身带来的冲击和压力构成了拉美国家反思和调整发展模式的一个外部激励因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曾一度成为拉美政界学界热议的话题。<sup>①</sup> 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高被视为对拉美国家的一种“叫醒服务”:良好的经济绩效得益于在巨大国内市场、农村人口、劳动力市场等初始条件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导向改革,而其中真正的秘密在于中国政府在实施改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造性和灵活性。拉美国家曾是发展中世界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但 20 世纪 60 年代起陆续为一拨又一拨的卷入发展浪潮的东亚国家所超越。问题不仅仅在于贸易占比和增长排序,问题还在于两相对照,一个国家 30 年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变化,而另一个地区却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改进。<sup>②</sup>

因此,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被视为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所致,而这种经济政策被视为具有内源性质,与拉美国家外源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完全不同。<sup>③</sup> 拉美国家必须发挥自己在地理、资源和区域整合方面的优势,并借鉴中国构建政府、企业和学界共识,形成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良性互动的经验,以克服拉美发展中无法绕开的瓶颈——提高竞争力。<sup>④</sup>

3. 平衡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就拉美国家而言,其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是追求国家和地区的自主性。在有关拉美国家“依附论”的阐述

---

① 参阅 Alex E. Fernández Jilberto and Barbara Hogenboom, eds., *Latin America Facing China: South-South Relations beyo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0; Riordan Roett and Guadalupe Paz, eds.,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mplication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② Robert Devlin, “China's Economic Rise,” in Riordan Roett and Guadalupe Paz, eds.,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mplication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111-147.

③ Alex E. Fernández Jilberto and Barbara Hogenboom, “Latin America and China: South-South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n Alex E. Fernández Jilberto and Barbara Hogenboom, eds., *Latin America Facing China: South-South Relations beyo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0, pp. 1-32.

④ Robert Devlin, “China's Economic Rise,” in Riordan Roett and Guadalupe Paz, eds.,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mplication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111-147.

中,可以看到19世纪门罗主义以及20世纪美国霸权的深刻影响。美国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认识拉美对外关系的关键。

面对外部压力,拉美国家除加强自身发展和开展地区联合外,还试图通过域外力量平衡美国的影响,这是一种“将依附性分散化”的战略。在二战后的历史上,拉美曾尝试借助业已恢复和重建的西欧国家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后,拉美国家还曾试图扩大与正值发展高峰的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联系。随着世纪之交中国的迅猛发展,拉美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政治交往跃上新的台阶。拉美主要国家虽不言明,但通过与中国在政治和多边场合的互动无疑具有平衡美国的考虑。拉美一些激进左翼国家领导人甚至在推进对华关系时有明确的反美主义表述。事实上,就拉美国家而言,与任何美国以外的域外大国加强联系,客观上都是牵制美国的举措。

### (三)拉美地区主义与中拉整体合作

21世纪初拉美地区主义的发展演变和中拉关系的全新局面,特别是拉共体与中国整体合作机制的启动,意味着拉美地区主义与中拉合作两条发展线索已经密切关联起来。这是一种崭新而独特的跨区域合作,目前其合作模式还属于初创和摸索阶段。在“区域间”或“跨区域”关系的研究文献中,跨区域互动往往涉及这种关系的形式、功能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的问题。<sup>①</sup>拉丁美洲与中国之间的“整体合作”,不属于两个区域集团间的交往形式,而是一个区域性集团与一个大国之间的对话,可以视为广义的“区域间”关系中的一种类型。其独特之处在于,这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另一发展中国家区域性集团建立的机制性联系,它不仅延续和拓展了历史上南南合作的传统和空间,而且有助于在世界经济“新常态”和国际政治变局中,塑造体现发展中国家理念、诉求的跨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层次、架构,为中拉双方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机遇。

就拉美国家而言,双方整体合作的现状和趋势至少呈现出三种主要的“功能”或意义,即“合理化”、“发展”和“势力均衡”。中拉整体合作涉及与合作机制“制度建设”和合作领域“议程设置”相关的合理化问题,但与相关文献中分析的由于全球层面议

<sup>①</sup>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Interregionalism: A New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iner Hä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3-14.

题“超载”而通过区域或“区域间”层次加以分解和处理的方向不同,中拉整体合作在功能上等同于将拉美地区主义碎片化和重叠化的状况加以整合,在全地区形成一个更高的层次处理与中国的合作问题,可以视为缓解不同层次治理难题的“合理化”努力。与此同时,鉴于拉美国家对外关系中“发展”维度的突出地位以及与西半球霸权国的关系态势,发展与抗衡不可能游离于拉美国家的战略考虑之外,特别是在拉美国家看来,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均显示出其特有的战略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从拉美地区主义的发展现状出发,仍有必要对中拉整体合作的定位、路径和基础加以澄清。中拉整体合作机制出台以后,相关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学者的归纳和分析)至少涉及中国国际战略选项和拉美对外关系优先目标、中拉关系演变进程、南南合作、跨区域合作、经济转型与对接、合作原则与实施路径以及地缘政治、国别差异等方面的问题。<sup>①</sup> 这些问题实际上概括了中拉“全面合作”方方面面的机遇和挑战,其中与“整体合作”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是“跨区域”合作和拉美国别、次区域和区域层次统一和协调问题,即如何以一个“整体”的形式与中国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因此,“整体合作”较为合适的定位毋宁是“全面合作”的一个层次和方面,当然它是中拉关系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十分重要的方向。在拉美国家发展进程和地区主义演变多元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将“整体合作”定位为“全面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中拉关系的全部内容,有助于避免分析上的陷阱和实践中的困境。

如果“全面合作”和“整体合作”的定位足够清晰,那么就合作路径或模式而言,全面合作就是在政治、经济、外交、人文各个领域以双边(国别)、次区域和区域各种渠道和途径展开的互动,也即现在双方在正式场合已经使用的“立体”和“五位一体”等用语,而居于其中的整体合作(即一对一模式)在分析上相对单一,在实践中则最具挑战性。根据《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6)》,全文共十四条内容,其中前三十三条列明了合作各领域的事项,第十四条则规定:“本规划将根据各自国内政策和法规,按照灵活和自愿参与原则予以实施……”,“具体合作倡议的落实或有关规则的通过将由中国同有关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具体商定”。自中拉论坛启动以来,双方已设立并召开了若干分论坛会

<sup>①</sup> 参阅周志伟、岳云霞:《中拉整体合作:发展逻辑、现实动力与未来发展》,载吴白乙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

议,即中拉论坛的运作主要以分论坛的形式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客观地讲,与中拉整体合作的定位相关,双方合作的实质内容更准确地应属于中拉“全面合作”的范畴。就拉美国家的认知而言,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政策文件为例,中拉合作规划所列首脑会议和论坛是未来几年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其中包括现有机制的继续和新机制的启动,但拉美国家需要就此展开两个方面的前期准备,即拉共体成员国在政治层次上的协调以及在具体合作领域的统一行动方案,包括双方设立的合作基金的使用办法。<sup>①</sup>这正是中拉整体合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但它并不妨碍中拉“全面合作”的持续展开。在拉美国家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步伐尚未到位之际,中拉合作的实质和主要内容为“全面合作”。

显而易见,作为全面合作之一部分的整体合作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即拉美地区主义的发展和总体外交框架下的对拉政策选项。在中国选项相对清晰而拉美地区主义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中国因素的介入是否可以促进拉美地区建设进程?这个问题不仅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偏好,而且还取决于中国的国家能力。虽然拉美国家普遍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机遇,但除根据“合作共赢”原则互惠互利外,中国因素效应的范围和强度有限。拉美的发展包括地区进程更多地取决于其他因素,本文列出美国因素、国别及次区域组织差异、经济新常态及发展模式、制度和地区主义逻辑等问题加以分析,旨在指出这些因素通过影响拉美地区进程进而影响中拉整体合作。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因素对于中拉全面合作和整体合作的影响并非总是同向同步的。

### 三、影响中拉整体合作的因素

#### (一)美国因素

从具体的地区主义实践来看,拉美区域合作受到两种相互竞争路径的影响。<sup>②</sup>第一种路径是泛美运动旗下“西半球理念”影响下的大陆整合,其特征是

---

<sup>①</sup>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owards a New Era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United Nations • Printed in Santiago, Chile, May 2015.

<sup>②</sup> Gordon Mace and Louis Bélanger, “Hemispheric Regionalism in Perspective,” in G. Mace and L. Bélanger, eds., *The Americas in Transition: The Contours of Regionalism*, Boulder, Colorado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 1—36; Diana Tussie, “Latin America: contrasting motivations for Regional Project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Supplement S1, 2009, pp. 169—188.

美国主导的整个美洲的合作。第二种路径则是拉美国家对第一种路径的抵制和抗衡,强调拉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合和经济合作。

冷战终结后,美国曾力推覆盖整个西半球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当这一计划陷入困境后,美国又通过一系列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推出所谓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在美国提供的机会和施加的压力面前,拉美国家由于经济、贸易结构以及政治取向差异而趋于分化。美拉双方关系天平的倾斜仍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和政策调整。拉美国家对美政策选项往往在“勉强接受”、“积极顺应”和“全面拒斥”三者之间徘徊。<sup>①</sup>

美国因素对拉美地区进程的分化和裂解效应从未像今天这样明显。这是中国因素发挥作用的地缘政治背景,也是对中拉整体合作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环境条件。就中拉“全面合作”而言,由于美国国内对中国在拉美的存在有不同判断,进而可能产生多种政策取向;而拉美国家亦可通过双边或次区域组织与中国发展关系,因此美国对拉美地区主义的裂解作用施加于中拉整体合作的负面影响未必同步影响中拉全面合作。

## (二)拉美国别差异

中拉合作规划的实施需要拉美国家进行必要的协调,这是拉美国家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拉美主要国家更重视双边合作的倾向反映着不同国家间利益竞争关系。以拉美最大国家巴西为例。冷战结束后,巴西外交政策主线之一便是通过领导地区整合谋求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票。但巴西历来规避主权的任何让渡或分享,巴西在自身利益需要时也会破坏或忽视区域组织的规则和标准。鉴于巴西的体量和雄心,其态度和立场决定了众多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事实上成为个别事件处理的论坛或领导人定期聚首、发表原则性声明的场合,而无法形成协调国家间关系的固定机制或约束成员国行为的正式规则。<sup>②</sup>

阿根廷和墨西哥是拉美两个在幅员、人口、经济体量和资源以及国际影响和

---

<sup>①</sup> Diana Tussie, "Latin America: contrasting motivations for regional project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Supplement S1, 2009, pp. 169-188; 参阅 Peter Smith,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Power, Politics, and Cooperation," in Peter Kingstone and Deborah Yasha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335-347.

<sup>②</sup> 参阅 Harold Trinkunas, "Brazil's Rise: Seeking Influence on Global Governance," *Latin American Initiative, 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 April 2014.

追求等方面能够挑战巴西领导地位的国家,也是与巴西同为20国集团成员的两个拉美国家。两国的外交目标之一是阻止任何单一国家“代表”整个地区,因而成为巴西入常最有力的反对者。巴西将地区整合理念涵盖范围由“拉美”调整为“南美”,意在将墨西哥排除在“地区”竞争者之外。而作为巴西邻国的阿根廷在推进地区整合的同时与美国(20世纪90年代)和委内瑞拉(21世纪最初10年)也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反映了防范强邻的矛盾心理。同属拉美左翼的委内瑞拉高调且与巴西不同的国际作为至少在地区层次上冲淡了巴西的地区整合努力。南方共同市场内的巴拉圭和乌拉圭,均希望借助域外国家或制度建设规制区域大国的行为。另外两个左翼执政的国家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在处理巴西公司经营问题上引起了外交纠纷,对区域整合的基础和气氛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南美洲范围内,只有秘鲁、哥伦比亚和智利与地区主导国家的关系较为融洽,但这些国家经贸联系和外交活动更多面向域外,区域整合很难成为最优先选项。<sup>①</sup>因此,无论是区域大国还是小国,与域外国家的双边关系往往会成为对外合作最具可行性的路径,以区域整体姿态与域外国家交往还有待进一步磨合。拉美国别差异与拉美各国多样性的对美关系是拉美地区组织分化、重叠的两个主要原因,而这三者又是影响拉美国家及其地区组织对外关系包括对华关系的基本因素。

21世纪初拉美区域版图的基本情况是,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形成了与南美洲不同的利益格局,其主要决定因素是贸易地理分布和对美关系。而南美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贸易取向和政治合作何为主线问题上受制于国内政局和政党轮替的影响,政策连续性常常受到干扰。巴西对承担地区领袖缺乏必要的意愿和能力,其他国家更不具备基本条件。而纵跨南北美洲的拉美太平洋联盟国家无疑希望面向更具活力的亚太地区。其中对华关系最为积极的国家均将双边关系作为首选。因此,在务实合作领域,拉美国家而言,中拉整体合作只能在双方全面合作基础上并在全面合作顺利进行的助推下,才能成为拉美国家逐步认可的选项。

### (三)新常态下拉美国家的利益诉求及其面临的挑战

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都面临着重要

---

<sup>①</sup> Andrés Malamud, “A Leader Without Followers? The Growing Divergence Between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Performance of Brazilian Foreign Policy,”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53, No. 3, 2011, pp. 1-24.

的选择。大宗商品需求和价格的下降对拉美出口和贸易条件产生的影响十分明显,产业部门竞争力虚弱的特点暴露无遗,说明拉美国家尚未克服历史形成的经济发展约束,即经济增长缺乏内源动力。

在从世纪初的经济高速发展到“新常态”的转折过程中,拉美的结构缺陷和现实需求决定了发展对华关系的新关注点:初级产品贸易高潮已告一段落,投资、信贷和金融合作作为双边关系发展引擎被提上日程。事实上,中拉论坛通过的合作规划已经确定了13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内容,中国领导人访拉时还提出了“3×3”的中拉经贸合作新模式。鉴于规划的目标仍十分宽泛,还需要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之中,这意味着拉美国家在政治和专门领域都面临着如何相互协调、平衡的巨大挑战。这种协调、平衡是地区建设的应有之意,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因素已经介入拉美国家区域整合进程。

所谓“新常态”既有结构性因素影响,也是周期性因素所致,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对于拉美来说,关键的问题还是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完善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拉双方在不同阶段均对对方的模式表示过特殊的关注,但互鉴与合作的深度还远远不够。拉美国家的发展客观上不断出现这一方面的需求,中拉合作在这里的开拓空间巨大,其中部分问题需要拉美国家在区域或次区域层次上加以解决。

在拉丁美洲,应对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路径有多项选择。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曾是结构主义学派发展理论的大本营,该机构于2014年发表专题报告,仍力主围绕生产领域构筑区域经济空间,新的区域整合基础及其未来取向应聚焦于提高生产率、追求规模经济效应、扩大经济互补空间以及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等,包括纳入全球价值链。<sup>①</sup>中国可以为这一进程做出贡献。就拉美而言,产能合作和产业对接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关键是契合拉方的切实需要使合作落到实处。

#### (四) 制度问题与地区主义逻辑

作为中拉整体合作一方的拉共体,是2010年在里约集团和拉美和加勒比一体化及发展峰会上成立的。从“功能”的角度考虑,拉共体是在上述两个组织的基础上,将议程整合并简化,形成了单一的政治对话和交流平台,地区性峰会数

---

<sup>①</sup>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 “Introduction: Time for Production Integr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Towards an Inclusive Value Chain Strategy*, United Nations, Printed in Santiago, Chile, May 2014, pp. 9–12.

目以及不同区域组织重叠的功能将有所减少,即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合理化”。然而,拉共体还没有建立常设机构,实行轮值主席国和“四驾马车”制,决策和议事规则为协商一致原则。因此,拉共体的局限在于缺乏明确而有效率的体制框架和组织结构,而这会严重影响与国际组织和域外国家交往的对接。<sup>①</sup>

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作为里约集团继承者的拉共体,如果仍以政治和外交对话为主要职能,应该是轻车熟路的。与此同时,作为拉美和加勒比一体化及发展峰会的继承者,它又必须承担社会经济和地区进程方面的职能。拉共体并未偏离以往拉美区域组织的发展轨迹和传统,就实际作为而言,拉共体既不优于也不次于拉美其他区域组织。中拉合作规划“关于倡议的落实”条款充分体现了双方能够确定的“最大公约数”,即灵活务实、因事制宜。由于中国是作为一个国家与一个正在演化中的国家集群发展关系,所以并未硬性尝试欧盟曾经要求于拉美的“整体对整体”的合作模式。但从中国对中拉关系发展的现状及趋势判断上看,中国的确期待着一种“集成方案”以提高外交资源利用效率。中国有中非论坛的经验可资借鉴,可适当做出“引领”姿态。而于拉美国家而言,这却有着某种制度“创设”色彩,政治和外交协调平台要兼顾甚或偏重经贸合作,并需适时出台对应机制。拉美国家地区建设进程曾起伏跌宕,不能排除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形成某种制度化机制的可能。这就需要关注拉美地区主义逻辑的特殊之处。

拉美地区主义历来具有多维特征,在基于历史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源于单一经济结构及贸易格局的利益矛盾挤压下,一个自然的后果就是地区建设更多地体现为“政治主导”的色彩。拉美地区主义往往被视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即作为外交政策资源以谋求另外的目标,如国际地位、地区稳定和政权的合法性。<sup>②</sup> 这些目标同样会催生大量的区域合作和整合的努力。拉美历史上不断翻新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正是这种努力的表现。因此,有拉美学者将拉美地区主

---

<sup>①</sup> Daniela Segovia,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etween the OAS and CELAC,” *European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No. 95, October 2013, pp. 103–104.

<sup>②</sup> 参阅 Andrés Malamud and Gian Luca Gardini, “Has Regionalism Peaked? The Latin American Quagmire and its Lessons,” in Lorenzo Fioramonti, ed., *Regionalism in a Changing Worl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116–133.

义发展状况称为“场合、计划和区域一体化实体的过剩。”<sup>①</sup>上述判断点明了拉美地区建设的一大特征,域外大国在与拉美地区组织打交道时,分辨其形式和内容是因势利导的前提。这为中国发力推进整体合作提供了空间。事实上,除中国外,拉共体也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

#### 四、结 语

作为跨区域合作的范例之一,中拉整体合作体现了地区主义形式与实践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中拉整体合作机制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因素已经介入拉美地区主义发展进程,整体合作的设计思想顺应了中拉关系与合作格局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体现了拉美地区主义合作领域和行为体广泛性与合作形式、机制灵活性的特点,也印证了跨地区合作模式文献中所揭示的地缘政治平衡、合作议程与决策合理化以及促进发展等功能。但中拉合作规划的具体项目和后续落实不仅涉及中拉双方的利益诉求,而且还关乎拉美地区主义进程自身的动力机制和内部整合,并且与拉美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全球经济结构与周期因素密切相关,双方能否利用并掌控好上述因素的影响,既是中拉合作面临的考验,也是拉美地区进程无法回避的难题。由于中拉合作设计思想的务实、灵活,中拉合作可以期待一种相对光明的前景。作为整体合作的重要条件,拉美地区整合能否进一步深化,则要取决于拉美国家之间如何协调相互关系以及推进地区建设的意愿。

#### 参考文献:

[1] Bulmer - Thomas, Victor.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Since Independenc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Dabéne, Olivier.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3] Farrell, Mary,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

<sup>①</sup> Pia Rigirozzi, “Crisis,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Regionalism beyond Euro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El regionalismo en América del Sur: Globalización desde el Sur o continuación de la política nacional por otros medios?” *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 - Argentina*, Buenos Aires, June 29, 2010, quoted from Jorge Hein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47, No. 3, 2012, p. 209.

Regionalism[C]. London and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2005.

[4] Fernández Jilberto, Alex E and Barbara Hogenboom, eds. Latin America Facing China: South — South Relations beyo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C].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0.

[5] Fioramonti, Lorenzo, ed. Regionalism in a Changing Worl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New Global Order[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6] Fitz Gerald Valpy, and Rosemary Thorp, eds. Economic Doctrines in Latin America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7] Hänggi, Heiner,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ä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8] Hearn, Adrian H, and José Luis León — Manríquez, eds. China Engages Latin America[C].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1.

[9] Kingstone, Peter, and Deborah Yasha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2

[10] Landman, Todd, and Neil Robinso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C].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009.

[11] Langenhove, Luk Van. Building Regions: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Order [M].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12] Laursen, Finn.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M].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13] Mace, Gordon, Louis Bélanger and contributors. The Americas in Transitions: The Contour of Regionalism[C]. Boulder, Colorado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14] Nilsson, Manuela, and Jan Gustafsson, eds. Latin America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15] Ocampo, José Antonio, and Juan Martin, eds.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Perspective[C].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tiago, Chile, 2003.

[16] Riggirozzi Pia, and Diana Tussie, eds. The Rise of Post — hegemonic Regionalism: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C]. Dordrecht, Heidelberg, London and New York: Springer, 2012.

(责任编辑:崔建树)